



# 菲、日將成後方濟各時代的亞洲中心

●王善卿／美國紐約聖若望大學歷史系博士、美國天主教歷史協會會員

2020年3月，天主教方濟各教宗（Pope Francis）就任將滿七年，仔細觀察2019年間，教廷在內部治理上所進行的方向調整以及中央各主責部會的人事變動，若視2020為方濟各時代的一個重要分水嶺，實非太大膽的預測。儘管2018年的教會因性侵醜聞及一連串的內部衝突而處境艱難，如CNN所謂的「地獄來的一年」（year from hell），然而，經過2019年的重整，可以看到兩個明顯的現象，一是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的影響力加劇，二是菲律賓在羅馬教會內的重要性日漸提高。故而，此次的日本之行不只象徵意義重大，更顯示羅馬教會的亞洲布局已近乎完成，教廷的福傳事業在2020年復活節之後，將進入新篇章。

## 教宗聲望跌入谷底的2018

儘管全球盡知方濟各是耶穌會士，卻不見得明白耶穌會教宗將對教會帶來何等革命性的影響。然而，對熟悉教廷生態與耶穌會歷史的人來說，其現代性與機動性將帶給教會內部翻天覆地的變革是可預期的。特別是貝格里奧（Jorge Mario Bergoglio）樞機選了「方濟各」（Francis）為名號，就已經明確宣告其「整修教會」（repair God's house）的意圖。果不其然，蜜月期過後，方濟各的行事風格及言論主張，開始引起爭議；他對同性戀的態度，讓保守派相當不滿；他的神學立場讓傳統派難以適應；2016年，《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頒布，這份對現代婚姻價值及家庭觀念提出全新思考方向的宗座勸諭將爭議推到最高點，正式啟動了羅馬天主教會內部的分裂與對立。2017年，美國知名的耶穌會士暨教廷傳播處顧問Fr. James Martin出版*Building a Bridge*一書並開始全球宣講，拋出同志友善的議題，內部鬥爭一發不可收拾；此外，教廷對於難民庇護與救助的主張也受到部分國家教會的抵制。義大利歷史學家Roberto de Mattei教授便曾評論道「天主教會內部正處於前所未見的混亂狀態，缺乏方向與清晰度，因而導致緊張對立與分歧，並替教會的分裂鋪路。」

對於新方向所引起的內部衝突，方濟各不但沒有妥協或試圖與保守派展開對話，相反地，他幾乎完全忽略這些聲音，既不回應也不解釋，放任歧異與不滿日漸加劇，2017

年因為Me Too事件的影響，教會內的性醜聞也逐漸被揭露，教宗親信、梵蒂岡財務總管澳洲籍樞機主教帕爾（Cardinal Pell）亦因性侵案遭到法院正式起訴；2018年，當教會歡慶方濟各教宗任職五周年慶時，教內保守派對他急行軍般的改革速度與前進方向抱持高度質疑的不滿情緒也差不多累積到瀕爆發的臨界點。隨著性醜聞處理失當的一一揭露，前教廷駐美大使Carlo Maria Viganò開了第一槍，之後羅馬天主教會可以說進入了內戰狀態。內鬥檯面化、弊端一一浮出。其中，最驚人的發展當屬因性醜聞所引發的蝴蝶效應——倉促簽訂的《中梵臨時協議》；至於稱得上教廷第三把交椅的帕爾樞機，則於2018年底因判決確定而被撤除財務長職務，被迫離開教廷權力中心。在這地獄般的一年裡，甚至出現教宗下台的聲音。

## 耶穌會的影響力日增

儘管性侵醜聞嚴重損傷教會的形象也重挫方濟各的聲望，但是，他卻從未停下組織改革。專研耶穌會與教廷關係的義大利教會史學者Michela Catto指出，自現代以來，耶穌會與教廷的關係一直相當敵對。在貝格里奧樞機當選為教宗之前，甚至沒有一個耶穌會士在梵蒂岡（Vatican）擔任領導層的職務，但是六年半之後，耶穌會士不但佈滿教廷各組織，此外，教宗於10月拔擢的十三位樞機主教中，有三位出身耶穌會（其中盧森堡大主教更出身自耶穌會日本省）。最重要的信理部於2017年起由西班牙耶穌會士Luis Ladaria Ferrer主持，其副手亦出身自耶穌會大學，換言之，耶穌會神學將成為信理部的主流；在2019年10月傳出教廷的財務醜聞後，方濟各再度清理門戶，並從耶穌會總部「借調」財務長西班牙籍會士Juan Antonio Guerrero Alves來主責經濟局，並在總會長要求下，打破教宗自訂的遴選規則，不擢升Fr. Alves為樞機。

此外，歷經2018的地獄年之後，教宗大力整頓梵蒂岡的新聞辦公室及傳播處，並改以他的義大利友人老牌梵蒂岡記者Andrea Tornielli擔任。儘管美國聖座史學者Christopher Bellitto認為領導者選擇與自己有相似的思維與背景的人選是邏輯之必然，然而，由這些人事案可以發現耶穌會已經從教會權力邊緣進駐到權力核心，教宗所屬的修會不但掌握了教義教理的詮釋權，若再佐以其原本就完善的全球網絡，可預期的是，耶穌會將成為教宗在笨重組織之外的新時代機動部隊。過去，耶穌會相當顧忌教皇，現在，耶穌會不僅是教宗最忠誠有力的側翼，並擔任起羅馬教會組織結構大轉型的要務。

## 從日、菲出發尋求教會的亞洲布局

日本的天主教人口比例低於1%，但是，日本在耶穌會史上卻有極特殊的地位。不只是在戰國時代的最初經營，整個二十世紀，還有兩位以日本為主要據點的耶穌會士當選為耶穌會的全球總會長，這在歐洲中心的天主教會傳統來說，是個異數。曾任總會長亦曾派駐菲律賓的Fr. Nicolas在退休後，選擇在東京的會院終老；而方濟各年輕時，日本亦是他最想前往的海外福傳之地，由於健康因素，他無法得到長上批准，但是在他成為耶



耶穌會阿根廷省長時，一次派出了五名年輕會士前往日本。其中之一不但成為現任日本省長，亦擔任他此次日本行的翻譯。儘管台灣的教友比例比日本高，但是，因耶穌會在日的長久經營與淵源以及與教宗的關係，耶穌會的日本省比起在台灣的耶穌會中華省更有擔任亞洲中心的條件。

菲律賓則是亞洲最大的天主教國家，信仰傳統已有數百年。在早期，因西班牙殖民之故，菲律賓成為支援教會亞洲發展的根據地之一，菲律賓聖人Lorenzo Ruiz更是死於日本教難。儘管菲律賓是道明會的大本營，但是耶穌會在菲律賓也經營甚深，例如耶穌會亞太會議的總部就設在馬尼拉。2019年，出身耶穌會大學的馬尼拉總主教Cardinal Tagle被拔擢至教廷擔任萬民福音部部長，主理全球福傳事業，此職位相當重要，教內俗稱「紅教宗」。此外，教宗亦派遣出身道明會大學的菲律賓神父Bernardito Auza擔任教廷駐聯合國觀察員及宗座駐西班牙特使。菲律賓的重要性，可由2019年道明會選出菲律賓神父擔任全球總會長一事見端倪，八百年來之所以首度選擇亞洲人當總會長，除種族平衡的考量之外，熟悉地緣政治有利修會的亞洲發展才是主因。

耶穌會與道明會在亞洲都是耕耘歷史相當悠久的修會。都有成為教廷側翼的能力。由於教會內部的對立以及性侵醜聞帶來的反教權主義，讓主教的權威性受到挑戰，傳信部近年亦開始嘗試在澳門、東京等地，推動「新慕道團」的培育，並由傳信部直接轄理。日本與菲律賓因歷史背景、資源與地緣因素，在後方濟各時代將成為教會亞洲發展藍圖中的樞紐。◆